

权威专家解读中国经济何时触底

□记者 金辉 北京报道

由北京大学中国保险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CCISSR)主办的“2016年第十三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日前在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等就供给侧改革、当前经济形势和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发表了各自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 未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来自创造性破坏

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增速下降，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主要是供给侧。为什么说供给侧？中国经济在过去30周年实现了10%左右的高速增长，这10%的增长是由大约10%左右的潜在增长率支撑的，潜在增长率是由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和提高速度决定的。

我们测算的结果显示，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大概是10%。如果经济增速低于10%就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有缺口。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受需求侧的冲击。中国在过去30多年发生了很多次经济低谷，都是需求侧的冲击，可以称作周期现象、需求现象。

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经济在2010发生了一个发展阶段的变化。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进入到中等偏上国家的行列。从更深层来看，我们经历了一个人口的转折点，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不再提高，从2010年开始负增长。反过来，我国人口抚养比到2010年降到最低点，在这之后就是上升的趋势，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些转折点怎么影响经济增长？第一，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此竞争力下降。第二，年轻一代远远比老一代受教育程度高，当年轻劳动力增长速度慢下来的时候，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也下降了。第三，当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就会出现，投资没有好的回报。第四，因为新成长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每年毕业的初中生，16—19岁的人群到2014年到达了峰值，去年开始负增长，这意味着劳动力进城的转移速度大大下降，它带来的资源重新配制效应会大大弱化，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减慢了，这些都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根据测算，2010年之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10%，实际增长也是10%。“十二五”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到7.6%，实际增长7.8%。到“十三五”，我们预计经济增长的潜在能力下降到6.2%，同时现在六点的增长速度还在潜在增长率之上，没有增长缺口，但是如果还以中国经济还有10%、9%增长，就会发现我们有增长缺口，因此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是供给侧的原因，要从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保增长。

它的含义是什么？我们现实工作中可以去杠杆、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那么上升到理论怎么做？在我们传统的增长源泉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固然还有一定潜力要挖掘，比如说劳动力供给还有潜力，农民工让他在城市都住下来，可以挖掘劳动力供给

●观察中国经济是不是触底，看两个底，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能不能走稳，供给侧主要看PPI能不能由负转正，然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触底了。

●经济触底以后会是一个大的“L”型走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反弹，有可能出现小的“W”型波动。

潜力，降低劳动力成本。但是更根本、更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在于创新发展，而创新发展对经济学家来说是全要素生产率驱动的发展。那么全要素生产率是生产要素投入之外带来的增长源泉，是效率的东西，归根结底是配制效率。过去30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来源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它意味着什么呢？农业是个劳动力过剩、生产力低的部门，当把过剩的资源吸引出来，投入到了更高、资源不足的产业中，会得到了一个资源重新配制效率，这个效率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分。

2014年农村16—19岁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是负增长，农民工的转移速度也就会越来越慢。这个急风暴雨式的资源重新配制的效率就越来越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像一个新古典式增长模式，那个时候还有资源重新配制的源泉。三大产业内要素流动是一个大的资源重新配制，那么在不同的行业之间还可以重新配制资源。在一个行业中，企业间还存在着巨大差距，你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我也是这个行业的企业，那么生产率差距如果还存在的的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生产率低的部门不应该存在，那么它的资源、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应该由生产率更高的企业来接管，这就叫做“创造性破坏”。创造性破坏是一个比较经济学的概念，更具体的来说，就是说要让企业进入，想进入的就要没有壁垒地进入，要让企业退出，它没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了就应该退出去，该死亡的就死亡，不能像僵尸一样存在，那么这样就可以重新发动新一轮资源重新配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发达经济体的研究中发现，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国家，就是靠行业内企业间的资源重新配制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比例可以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此很显然，中国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应该来自于创造性破坏。

那么创造性破坏就面临着一个问题，我们不破坏就不能创造，因此我们要舍得破坏。但是过剩产能可以破坏，没有效率的僵尸企业可以破坏，甚至不再有竞争力的岗位、技能也可以破坏，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破坏，就是人，就是劳动者。因为劳动这个生产要素和其它生产要素不一样，它的载体是人，而人是不能破坏的。但是在今后就不能这样，保护这个岗位就保护了这个行业，这个企业，就保护了落后。我要破坏它，但是人不能破坏，因此不要让我们的产业政策解决问题，要让社会政策对人进行保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政策托底和创造性破坏之间的关系。

专家纵论普惠金融发展之道

□任达

由人民大学国发院、“人大老博士论坛”、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和人大出版社主办的“供给侧改革与数字化普惠金融——人大老博士论坛暨《读懂十三五》新书推介会”日前在京举行。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谢平和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等就当前如何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发展普惠金融等展开了讨论。

数字技术助益普惠金融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表示，对于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的金融服务的供给，一些弱小微企业以及一些弱势群体金融服务的供给，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短板。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来说，推进金融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发展普惠金融来补金融业的短板，这也是“十三五”规划所确定的中国金融业发展“十三五”发展中一个很核心的内容。

潘功胜认为提升金融效率和降低风险成本始终是制约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因素。“我们需要寻找一个平衡的路径，即另外一条路径，比如探索通过技术的进步，来降低提供普惠金融供给的成本，提升它供给的效率和降低它的风险的水平。”

国研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 今后一两年 中国经济将实现触底

“十三五”时期，从比较长的经济增长历史过程来讲，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经济转型，就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的过程。把这个事儿做好、做实，“十三五”就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要做得不容易，这里边首先有个理论问题，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下降？除了有供给因素外，还要关注长期需求问题。假设中国劳动力数量不变，人口结构也不变，高速增长就能一直持续下去？也持续不下去，到了某个点还会掉下去。因为一些重要工业产品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达了，比如房地产、重化工业等产能过剩产品，可以看作长期需求方面的约束。中国从2010年到现在，一系列的历史需求峰值全部出现，包括房地产、钢铁、煤炭等，这个需求最高点都出现了。

无论是发展经济学还是经济增长理论，过去主要研究的都是后进国家的经济起飞问题，但是起飞以后能飞多长时间？有的没飞多久就中途落下了，这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有一些经济体可能飞的时间更长一点，但是不可能一直在那个高度上飞行，也会下降，包括东亚的日本、韩国以及中国。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时做的一项研究表明，这些追赶型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无一例外都出现回落，而且都充分利用了增长潜力。而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比如拉美，人均GDP都没有超过7000国际元。

最近都在讨论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说中国会不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我认为，中国不会落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从飞机飞行的过程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超过7000国际元，中国那个点已经过去了。现在飞机在降落，但是落到什么程度上，落下来后是到飞机跑道上还是高速公路上，达到美国式的成熟经济的状态，还不能确定。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会呈现一种什么样的走势。从2010年一季度到目前为止，整体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底在何方？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判断，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是符合规律的，既有供给侧发生了变化，也有需求侧历史需求峰值的变化。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即转型再平衡，也就是经济增速10%左右是一种状况，将来可能到中速增长的时候是另外一种供求平衡状态。目前还在这个过程中，所以下行压力还是很大。

供给，可能把穷人排斥在金融服务之外。

推行普惠金融需要改变补贴方式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谢平认为，在推行普惠金融的过程中，补贴是必不可少的，但需要改变补贴方式，从传统的财政补贴逐步过渡到数据补贴，即国家的免费提供数据基础设施，征信系统免费和推行地方数据平台的大平台建设。普惠金融的短板是成本和风控问题。比起传统的政府财政补贴，普惠金融实现补贴的方式更为多样化。国家可以向一些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提供补贴，推广手机银行。另一种模式被称之为“阿里模式”，阿里巴巴为商家提供从贷款、生产到销售及支付的一条龙服务，这其中的某些环节可能是亏损的而其他环节盈利，可以实现内部交叉补贴。阿里巴巴还成功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运用于风险控制环节，大数据不仅颠覆了传统的风险控制模式，还降低了风控成本。相信“数据金融”是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缺失问题的解决之道。

互联网金融政策方向 应是规范发展鼓励竞争

蚂蚁金服集团首席战略官陈龙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新经济需要新金融，中国互联网金融对推动普惠金融做出

中国经济要触底，主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个角度来看。首先是需求的底要触到。从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过去十几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来带动的，高投资由三个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占20%—25%，房地产占25%—30%，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剩下的是农业和其它服务业。出口、基础设施、房地产是中国经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的三大需求来源，中国经济减速主要表现在这三大需求在调整，具体表现在投资的增速在回落，然后要触底。高投资要触底，三大需求要落地，通俗的说法是三只靴子要落地。

其中，出口这只靴子已经落地，基础设施占投资的最高点是2000年左右，它是回落的态势，但它是政府稳增长的工具，波动比较大，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2014年开始回调，出现历史性拐点。历史需求峰值就是1200万—1300万，房地产投资不会再增加，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去年降到1%。我们原来预计，房地产投资增长会持续一段时间，房地产投资什么时候由负转正，就稳下来了。投资触底，中国经济也就触底，原来估计是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上半年。

从供给侧来讲，这个变化比较复杂，需求在往下走，供给也在往下走，但是下得比较慢。钢铁、煤炭产能过剩基本上都在30%以上，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第一个是PPI连续48个月负增长，再一个是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这个是非常要命的，这会导致企业的经济状况差，财政受到冲击，银行贷款不良率会大幅上升。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思路，第一种是放货币，把需求提上去，但是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引起的通缩，而是由于长期大幅度的结构性的调整造成的过剩产能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PPI下行，放货币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房地产、钢铁的需求，房顶已经看见了，需求上不来。那么出路在什么地方呢？只能去产能，比如说煤炭、钢铁行业，至少去掉20%产能，去掉以后利润才能回升。这个是从供给侧来看的一个底。观察中国经济不是触底，看两个底，三个指标，需求侧主要看投资能不能走稳，供给侧主要看PPI能不能由负转正，然后是工业企业利润由负转正。如果这三个指标都发生了变化，就可以认为中国经济触底了。中国经济经过六年的调整后，经济已经非常接近底部了。

今年一季度出现一些新情况，房地产投资回升到6%，PPI回升到-4.3%，工业企业利润也出现正增长，我不感到乐观。一季度主要是短期因素推动，房地产投资为什么有明显上升？一线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涨改善预期拉动住房销售和投资，目前一线城市住房销售量和价格已经下来，政府投资拉动基础设施投资比较大，效果如何还有待观察。关键是看几个月以后的低点在什么地方。这个低点如果低于前一个低点，就可能还会下滑，如果不会低于前一个低点，有可能构筑一个新的平台，中国经济中速增长的底部出现需要多次验证，总的判断，今后一两年底部会出现，前提是供给侧改革要真抓实干，去产能必须要到位。

经济触底以后会是一个大的“L”型走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反弹，有可能出现小的“W”型波动，今年一季度的反弹如果是中国经济触底的开始，很可能是第一个“W”型出现。这个平台出现意义重大，就是一个中速增长的平台，最少维持十年左右。

了显著贡献，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政策方向应该是规范发展，鼓励竞争。

从供给侧改革与普惠金融的关系看，中国的新经济是消费驱动和技术驱动，相匹配的金融是以新的基础设施为基础的。中国金融体系本身因为经济增长模式的改变会发生改变。技术的进步为新金融的发展提供三大支点：一是移动互联网，二是大数据，三是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增加金融的触达能力，大数据的运用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甄别风险，云计算会让金融成本大大降低，提高金融效率。以这三大支点为基础形成的金融，即数字普惠金融是与中国经济转型相匹配的。金融的创新并不只是金融属性的创新，与场景结合进行创新，即金融场景化是互联网金融的未来。

在互联网金融助推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金融科技只是开端，金融生活才是趋势。互联网借助数据、客户渠道和资金来源的优势，让金融真正服务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目前阿里已在小微企业融资和服务农村用户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

在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互联网金融不改变金融实质，核心症结和处方依然不变。互联网金融风险的症结依然在金融中介存在道德风险和经营风险，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解决途径在于，一要明确准入门槛，二是加强信息披露和监管要求，三是明确产品投资者的适当性。

郑新立：

从五方面完善 “一带一路”信用体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郑新立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一带一路”信用论坛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应从五方面抓紧完善信用体系建设，确保“一带一路”健康发展。

一是要抓紧建立市场主体的诚信体系，特别是沿线国家企业的信用征信体系。二是要建立以我为主的信用评级机构。现在国际上信用评级基本上被美国的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所垄断。“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雷曼兄弟公司也是这三大评级公司评的级，评的是A+，这样一个信用级别的公司轰然倒塌，使投资该公司的股东血本无归。再也不能由一个国家的信用评级体系，垄断全球的信用评级业务。”

关键还要建立以我为主的信用评级机构。由于成立时间较晚，现在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国际和国内的影响力与三大评级公司相比还差的比较远，所以要抓紧建立以我为主的信用评级机构，并且要做大做强。包括跟沿线国家合作，吸取他们的优秀评级机构，联合起来成立一些新的评级机构。

三是要建立商品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包括食品的质量和各种商品的环保标准，质量标准。

四是要完善与信用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

五是建立诚信的道德标准。在“一带一路”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中间要倡导诚信，遵守道德标准。（关欣）

深圳创研院报告：

落实供给侧改革最重要是 坚持国企改革正确方向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28日在京发布的《中国改革报告2015》指出，2015年中国的改革已经实现从总体设计到全面建设的跨越，使以国家治理现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报告提出深化改革九项重大措施建议。

报告建议，把经济“平等”作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价值取向，最大程度地凝练改革共识与动力。用开拓性思维推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加快资本、土地、网络等资源网络类要素市场的改革，尽快形成市场决定机制和公平准入的制度。把“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参与TPP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对外开放的两大扇面。

报告指出，落实中央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大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国有企业改革的正确方向，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真正从体制机制上对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的结构动手术，消除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积压严重、库存膨胀、结构失衡等背后深层次的原因。通过深化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的调整，使处于劣势的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快捷、平稳、有序地退出，形成资本能进能出、企业能生能死的自我动态调整机制；同时加快国有企业内部决策、经营机制的改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的活力，使之更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使我国的经济在新的基础上实现协调、健康、有序的发展，确保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成功。（沈园）

专家：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与社科文献出版社近日发布的《京津冀蓝皮书：京津冀发展报告(2016)》指出，加大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

蓝皮书主编、京津冀大数据研究中心主任、首经贸祝尔娟教授认为，未来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化疏解政策，加大非首都功能疏解力度。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 and 城市功能拓展区企业综合发展水平最高，这也是进行非首都功能向外疏解的重点区域，这意味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措施来保障，如可出台“首都功能核心区内的企业额外加征20%企业所得税”“首都功能核心区企业就业人员积分落户申请立减5分”等政策，促进核心区企业向外疏解。二是优化企业在区域内的空间布局。京津冀三地企业发展水平内部落差巨大，北京企业实力远高于天津和河北，河北企业发展实力不足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的空间布局上：北京市内的疏解重点应放在城市发展新区，以促进“产城融合”；天津的重点在于通过承接非首都功能，缓解滨海新区“一枝独大”状况；河北在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上应选择优势地区和优势园区进行承接，注重在打造产业轴的同时打造城镇轴和人口聚集轴。三是强调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功能定位的相互衔接。北京应强化其在区域内的核心地位和引领的作用，天津应强调体制机制创新，而河北重点在于生态修复和环境改善。（佳宁）